

# 處於政治與欲望之間的身體 ——評馮珠娣《饕餮之欲：當代中國的食與色》

● 鮑 磊

在《饕餮之欲》中，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中國人社會心理和集體潛意識的流變，探討了流行於當前中國民眾生活經驗中有關身體、欲望、性別、人際關係以及社會秩序的新型意識形態。



馮珠娣 (Judith Farquhar) 著，郭乙瑤、馬磊、江素俠譯：《饕餮之欲：當代中國的食與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與社會結構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並帶來社會心態與內在價值觀念的嬗變。在這一過程中，原先被遮蔽、隱晦存在着的身體，也不斷被揭掉幕紗，走到前台。在突破一道又一道「防線」(禁忌)之後，身體逐漸成為人們感覺與欲望的源頭與核心。

由於受西方社會科學主流傳統的影響以及在關注社會現實時所表現的理論傾向與選擇，以往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研究較具宏觀色彩，偏重於分析宏大的制度變遷，焦點放在「系統」、「結構」、「階級」、「政黨」、「經濟」等概念之上，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常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研究者似乎能置「身(體)」於外。即便存在弱勢的微觀(日常生活)社會學，還是強調人的行為受

\* 本文的寫作得到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985工程」項目「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體驗」(NJU985JD07)的支持。

## 一 將身體研究置於歷史的話語之中

馮珠娣在引言中直陳，該書有兩個目標：一是現象學的描述，捕捉對身體及其欲望產生影響的某一特定歷史瞬間；二是方法論的創新，把人類學關於身體的研究與人類學關於話語和實踐的研究結合起來（頁4-5、6、11）。

對於第一個目標，作者意圖把「身體體現」(embodiment) ②放在特定的歷史與群體中加以考察，放棄撰寫關於身體的哲學著作，也不試圖界定某個理論客體，而是描述關於身體的某些歷史活動，討論身體被體現的歷史。馮珠娣把她想捕捉的歷史瞬間描述為「不是當前但也不完全是過去」(頁29)，也「不是要準確地描述這30年，而是展示這個時代的藍圖及成就在日常生活和習慣諸層面的存續，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頁12)。對於這個歷史瞬間，學術界多用「社會轉型期」或「轉型社會」稱呼之。作者運用「定位的方式，通過把世俗生活置入一個更廣闊、更為人知、而且是全民化的大背景中來勾勒當代中國一段特定的歷史時期」(頁12)。

為着達到第二個目標，即方法論的創新，馮珠娣對資料來源進行了擴展與模糊化處理，尋找其中的個體差異和共同的世俗幻想。只要是可以作為民族志文本的素材，作者都拿來使用。她在研究中結合了文學批評、文本分析和民族志考察，閱讀了包括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文化作品，如小說、故

馮珠娣意圖把「身體體現」放在特定的歷史與群體中加以考察，放棄撰寫關於身體的哲學著作，也不試圖界定某個理論客體，而是描述關於身體的某些歷史活動，討論身體被體現的歷史。

到社會結構的制約與影響，突出人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化。簡言之，在中國社會中是看不見身體的①。

不過，隨着當代思想中「身體轉向」、「回到身體」、「發現身體」或者「重返身體」的呼聲愈來愈高，以往對身體存而不論、視而不見的狀況大大改變。尤其自二十世紀末以來，西方學界有關身體研究的著作被大量引介進來，許多研究者也投「身(體)」其中，對身體表現出濃厚的研究興趣。那些從事微觀社會學研究的學者，也似乎尋獲了一個巨大的學術生長點。

在這一背景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馮珠娣(Judith Farquhar)的《饕餮之欲：當代中國的食與色》(*Appetites: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中譯本(引用只註頁碼)於2009年問世，正當其時。該書堪稱一部研究身體的出色之作，不過作者並不是就身體而論身體，而是撇開從政治、經濟等層面作宏大敘事，轉而從日常生活中的「食」和「色」兩方面入手，審視當代中國人「欲望」的變遷，揭示體現在身體之中的「快樂」的政治和歷史本質。

馮珠娣曾在中國大陸做過訪問學者，在多個地方從事過田野調查，對中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有着實際的感受；她對中醫知識頗為熟稔，對中國各類民族志文本亦有相當程度的涉獵。在該書中，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中國人社會心理和集體潛意識的流變，探討了流行於當前中國民眾生活經驗中有關身體、欲望、性別、人際關係以及社會秩序的新型意識形態。

馮珠娣探討了毛澤東時代和改革時期關於飢餓、饜足和健康及其與政治之間的聯繫。在她看來，食物和政治成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共產黨利用與食物相關的寓言和隱喻來宣傳集體意識形態。

事、電影、社會科學調查、知名的傳統老中醫的自傳、傳統中醫醫療案例以及關於古代性藝術(房中術)的史料，所用素材甚至包括作者本人1980年代之後在廣州、山東鄒平和北京的某些經歷。

在中國人日常生活從苦行主義到市場經濟繁榮的轉化過程中，過去時代的影子仍依稀可見，所以馮珠娣持一種連續性觀念，而且把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的差異作為論述的主要出發點和基礎。作者採用比較分析的方法，不停地切換集體時代的欲望和改革時代的欲望兩大場景，其所暗含的預設是：傳統與現代、集體與個人之間存在着對應，兩種思想面目存在着交鋒，但並不存在決然的對立。同時，馮珠娣提供了許多關於毛時代的觀念、渴望持續存在的例子，以表明集體時代通過無數種方式繼續影響着改革時期的中國社會與人。所以，本文使用「處於政治與欲望之間的身體」作為標題，意在表明一種拉鋸戰，這裏的「政治」應該從廣義的角度去審視，我們也可以代之以「歷史」、「傳統」、「集體」之類的概念，而「欲望」也同樣可以用「經濟」、「市場」乃至「消費」之類的概念來替換。

實際上，馮珠娣還有一個意圖，那就是矯正人類學書寫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論傾向。她試圖通過馬克思的觀點，避免唯心論者關於「意識」問題故弄玄虛，而是堅持人類意識和人類身體都來源於「真正存在的活動的人」的具體「感官活動」(頁7)。正是基於這種唯物論的立場，她視「欲望」(appetite)為「身體

的真實經歷」(頁2)。但作者在關注歷史中的身體體現，把文化人類學置於超越階級利益的符號象徵、意義以及社會關係之中加以考慮時，也堅持人類活動的複雜性。因為「身體並不是思想意志的無生命或是被動的奴隸，它擁有語言和歷史，能對特定環境作出反應」(頁8)。

## 二 中國的「食物政治經濟學」

本書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吃：感覺的政治」包含三個章節：「藥膳」、「精神會餐」、「『實』與『虛』」，主要考察了食物和中國醫學實踐的倫理和政治。

在論述「吃作為一種感覺政治」時，馮珠娣探討了毛時代和改革時期關於飢餓、饜足和健康及其與政治之間的聯繫。在她看來，食物和政治成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在毛時代的較長時期內，食物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所有的食物都是作為集體的人民的財產。共產黨利用與食物相關的寓言和隱喻來宣傳集體意識形態。1976年，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領導相繼去世後，新一代領導人(尤其是伴隨着鄧小平重新掌握領導權)開始了經濟改革、擴大私有企業，並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參與世界市場，這急劇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飲食模式和消費實踐。馮珠娣認為，雖然今天的中國享受了快速發展的餐館文化，多樣而富足的食物產品被用於私人消費，但對過去飢

餓的記憶仍然影響着當代的飲食模式。她把這種直接源於毛時代的食物政治，以及延續了食物之政治化的當代中國飲食實踐(即「吃」)，視為帶有犯罪感的興奮。

馮珠娣曾在中國學習過中醫數年，因此，書中多處可見她用中醫的知識來分析中國人的食與色。在討論藥膳時，她就用較長的篇幅探討了中醫的邏輯與實踐，把世俗權力與飲食和醫藥放在一起進行討論。中國獨有的藥膳，既是味覺的語言、體驗的具體反映，也是中醫邏輯在實踐中的內在體現。中藥以五味雜陳和以一對百的方式，綜合運用動物、植物以及礦物質來應付身體的變化。中藥具有魅惑之力，既能讓毛時代忍飢挨餓的身體經受住物質的匱乏，也能讓後毛時代的身體得到調理，並大飽口福。

馮珠娣把中國的食物政治看作是由「過剩和匱乏」引導，它與中醫

的重要概念相類比，即醫學語言中的「虛損」和「實邪」，處於二者之間是最佳的健康狀態——即「保持身體適度活躍」(頁146)；進而，她又把中醫學中「過剩」和「不足」的觀念，與對改革時期經濟不平等的政治批判相類比，引導讀者關注傳統中醫學方式及其功能與中國政體的相似性。當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虛損是系統性的，而實邪只表現為局部性。中醫成為改革開放時期過剩與匱乏問題的隱喻載體，它解決虛損與實邪症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來解決吃好的問題(頁150)。通過提供預防性和醫療性兼具的策略，中醫提倡一種可見的健康和身體操練——一種基於對身體的經濟管理。

透過對毛時代的經典作品《白毛女》的審讀，以及對古華、陸文夫和莫言等人作品的分析，馮珠娣試圖通過身體和食物來呈現中國社會的政治變化——在何種程度上飢

對於當前中國社會中的「饜足」景象，馮珠娣認為不過是用一個新的物質的烏托邦替代了舊有的精神的烏托邦之把戲，民眾的精神困境依然頑固地存在着，社會關係的不平衡也沒有在「饜養」的美夢中得到解決。



馮珠娣用中醫的知識來分析中國人的食與色

餓和饜足可以視為自然狀態，或者作為政治條件的反映。她以《白毛女》和小說《芙蓉鎮》為例，表達出中國人意識中的兩極：牢記苦難與精神會餐。顯然，這構成了一對新的矛盾，香噴噴的幻覺總是那麼誘人，愛吃之本性總是格外強烈，但現實總是如此缺乏物質。於是意識兩極繼續分化：一方面是尋求身體的盛宴，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精神苦修以超越需求。

對於當前中國社會中的「饜足」景象，馮珠娣認為，這只不過是用一個新的物質的烏托邦替代了舊有的精神的烏托邦之把戲而已，民眾的精神困境依然頑固地存在着，社會關係的不平衡也沒有在「饜餐」的美夢中得到解決，甚至還加重了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食物依然具有政治性，「飽食之中依然隱藏着致命的極度匱乏」。對此，馮珠娣認為，倘若能夠在過剩與匱乏、實邪與虛損的兩極之間找到一條協調之路，人們才有可能學會「品味我們的食物，承擔我們的責任，並在熱情中歡悅」（頁152）。

### 三 中國的「色欲政治社會學」

「食色，性也」，食在前，而色居後。在內容安排上，前文已提到本書第一部分是寫口舌之快（食），第二部分「欲：體現的倫理」則落實到寫性（色），恰契合了飽暖之後思淫欲的邏輯。當然，這裏探討的食與色已超越了生理需要的層次。這一部分也包含三個章節：「書寫自

我：個人的羅曼史」、「性科學：行為的再現」、「色情藝術」。

馮珠娣先是檢視了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的主體性、愛、性別、性差異和性事。在本部分的導言中，作者暗含着這樣一個假設：主體性的產生是產生現代性實踐的先決條件。她認為改革時代的文學作品中，私密性的愛與性是一種建構，是對成功締造了集體主義之愛的王國的反抗，而不是「在扭曲人性的集體主義時代之後向自然的人類選擇的回歸」（頁159）。她認為，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毛澤東思想把個體認同歸屬到對集體的認同，私密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激情的公開展示也是不允許的。朋友之間的聚會雖大量存在，但卻是秘密進行的。可以說，除了夫婦擁有私人空間，任何直接與性有關的活動是非常少見的。此時，多數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話）與異性之間的聯繫具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性含義在裏面，例如丁玲小說《杜晚香》（1978）中性徵模糊、創造着集體主義的純粹快樂的杜晚香，正顯示了一種壓抑的性倫理。

1978年以後，公眾對於對集體主義的堅守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產生了一種新的個體感，例如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1980）便開始了對真實的性和婚姻的探索性描寫。當然，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真正可以實現個人化生活的條件卻遲遲沒有到來。通過分析幾個追溯個體主體性形成的文本，馮珠娣表明一種「自主的自我」（能夠做出基於個人利益的選擇）對於新的性範式產生的必要性。

作者暗含着一個假設：主體性的產生是產生現代性實踐的先決條件。通過分析幾個追溯個體主體性形成的文本，馮珠娣表明一種「自主的自我」對於新的性範式產生的必要性。

接下來，馮珠娣探討了改革時代早期，那些把主體性和私人生活的觀念帶進公共話語中的文學作品。她把這些作品與反映毛時代的作品相聯繫（如《杜晚香》表徵了一個集體意志的理想化場景），從而彰顯了後毛時代的作品中個人化、私密性的情感場景。事實上，在馮珠娣看來，改革初期新流行的寫作風格中，對自我的某種展演策略的使用（可理解為對身體的召喚、勸誡、責備、希求等等），也可視為是對存在（existence）的質問。只有這種個人自我得以建構後，性才有可能成為現代中國體驗的一種形式。

1980年代中期以來，全國範圍內發生「性爆炸」。此時，不再完全由國家控制的市場開始提供色情作品、性保健指南以及性學經典，包含露骨性鏡頭的電影、出售避孕套的商店、「性助器」等紛紛出現，性圖像瀰漫於各種廣告之中。但同時，通過性傳播的疾病也在迅猛增加。在城市和農村地區，新開了一些診斷性問題的專業診所。性學家開始從事性研究和性教育活動。換言之，當代中國的性爆炸與歐美西方文化中已談論幾百年的性具有完全相同的意涵。

相應地，馮珠娣指出，這種新的性範式已經凌駕於生殖層面的性之上。例如，手淫引起大範圍的關注和討論，很多人認為這種自我為中心的行為是自然的，只是不利於健康。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精神疾病的分類和診斷標準》的2001年版本中，仍然把同性戀從官方認可的精神疾病清單中撤了下來，而把同性

戀作為話題的一些性學作品，也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反對態度（頁199）。在作者看來，中國已經存在一種可以稱為「性欲」的客體，它與全球現代性有着特殊的關係，科學通過調查研究的方式調適着這種關係。由此，作者把討論的重點放在性學研究和性教育上，因為「系統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以及普遍專業知識的權威性共同使特殊的欲望和實踐形式具有真實性」（頁203）。

作者認為，通過科學方法中典型的具體化和簡約化方法，出現於中國大眾文化主流中的「性欲」問題逐漸被自然化和普遍化，進而「殖民化」了中國人的身體。由於性依然是一個被約束而又混亂的範疇，因此，只有運用現代的、世界主義的方法對性行為進行比較、概括，把它普遍化和正常化，讓全國的年輕人都真正明白甚麼是負責任的性行為；只有通過談論、寫作、出版和教育的渠道，才能使人們在政治上和身體上擺脫黑暗過去的想像，獲得自由（頁224）。

馮珠娣批判了性調查研究和具有啟蒙性、現代性的性教育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滲進中國文化之中，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國民教育。她認為，這種調查像小說一樣，具有反思和創造經驗的雙重能力，並且這種性調查已經使得中國的性以帶有色情的方式融入狹窄的現代西方概念中。在她看來，由於「國家進步和發展」是並且一直被作為目標（頁211），中國的性教育傳布了民族主義；但同時，西方性健康概念也影響着中國

在作者看來，中國已經存在一種可以稱為「性欲」的客體，它與全球現代性有着特殊的關係，科學通過調查研究的方式調適着這種關係。由此，作者把討論的重點放在性學研究和性教育上。

的性教育，這恰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頁216)。

在最後一章對中國人「房中術」的分析中，馮珠娣發現性教育的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到了當前流行的性文學。通過重新理解古代中國的性指南或醫學著作，當代的性文本為現代化了的性實踐確立了先例，同時也強調了性實踐的獨特中國傳統。然而，這些文本也使大男子主義合理化了。「房中術文本的功能是通過依賴行樂把對國家和父權制的自然化願望結合起來。這並不是精英們有意和人民作對，相反，這是一種極端矛盾的常識。」(頁258)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重新對男性氣質的強調已不斷引起人們對男性性功能障礙的關注。馮珠娣認為，陽痿已經成為最近幾年中國流行的話語，並被罩上科學的光環，一時間，「鋪天蓋地」治療陽痿的廣告出現在大街小巷能夠張貼的地方。在美國大洋彼岸的「偉哥」(Viagra)來到中國後，受到很多男人(也包括女人)的青睞。而人們對性能力的普遍擔心以及對性無能的自我診斷，很容易被理解為一種隱喻：某類人群權力的減弱(比如書中提到的領導幹部)或民族的弱點(中國曾經被看作是落後的國家)(頁47)。

馮珠娣認為，正是民族主義者和反對毛澤東主義者的情緒、對完美社會等級秩序的幻想，以及對男性氣質和性的焦慮，刺激了傳統色情藝術作品的復興。在對傳統「性藝術」進行解讀時，她試圖再現一種國家遺產和歷史上特殊的身體所展現的風格和政治。

#### 四 去政治化時代的食與色？

在評價該書時，倫敦商學院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認為，作者創建了一種全新的「物質文化人類學研究模式」，有助於我們領悟物質實踐以何種方式傳遞着歷史的意義。加州大學教授拉斐爾(Lisa Rofel，又譯羅麗莎)則認為，作者「精當地闡釋了〔身體〕體現如何被打上了歷史和政治的烙印，如何與當代中國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封底)。筆者認為，儘管馮珠娣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不免有點浮泛(如用中醫「虛」、「實」的觀念來比附社會)，在所用材料與閱讀層面上也稍顯狹窄，同時可能由於作者面向的是北美讀者，因此，全書讀起來不免像一個身居中國的美國人所寫的感受錄，在某種程度上欠缺嚴謹性。不過，我們完全可以將作者的努力視為一種「邀約」，與其一道對中國社會的欲望進行歷史、文化和個人維度的分析，並探求意識形態塑造身體經驗的方式。畢竟這方面的深入學理分析還較為少見。

此外，馮珠娣所描述的場景基本上都發生在1970到1990年代，如果說此時的身體在受到(歷史)政治牽絆約束的同時，面臨欲望的牽引，尚給人一種「欲罷不能」的感覺，那麼，在這之後，尤其是在跨入新世紀之後，隨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在拋卻歷史、棄絕政治，踏上「消費社會」之路時，人們的身體將擺放何處？人們的欲望盡頭又在何處呢？或許，「人們終

儘管馮珠娣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不免有點浮泛，在所用材料與閱讀層面上也稍顯狹窄，全書讀起來不免像一個身居中國的美國人所寫的感受錄，在某種程度上欠缺嚴謹性。

於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相互關係了」<sup>③</sup>。典型者，如1990年代以來出現在文學領域的「身體寫作」流派與「下半身詩歌」流派<sup>④</sup>，雖是強調寫作中的「身體性」，重在表現身體的質感與無理性的生活，還身體以真實的生命力，但很多作品到最後都流落於對性(色情)進行赤裸裸的描繪——瘋狂「縱欲」之後陷入莫名的焦慮與彷徨之中。再如2009年6月7日至14日在上海舉行的國內首個同性戀文化節，表明大部分公眾已經容忍、接納，或至少不再敵視同性戀者了，同性戀儼然已從「異態」進入「常態」的範疇<sup>⑤</sup>。社會變遷之快，恐怕馮珠娣也始料未及。

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預見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政治與經濟(欲望、消費)之間針對身體的拉鋸戰可能還會處於焦灼狀態。儘管經濟迅猛發展，物質產品愈益豐富，由消費所勾起的欲望似乎愈發居於有利的地勢，但在中國社會，歷史(傳統)與政治的力量依然強大，足可為身體行為乃至思想的言語表達設定底線、框定範圍，因而掌控個人身體亦非完全不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制度性的結構與權力仍然束縛或駕馭着身體，過去的三十多年，政治影響力減弱並不算明顯。再者，在當前打破施加在身上的一切枷鎖的口號下，我們似乎應該保持警醒，慎防以解放身體之名行糟蹋自己與他人身體之實。如吸毒雖然也被有些人視為解放身體的一種路徑，但顯然屬於反社會的行為。此時，政治的介入或干預(掃毒)就理所當然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社會生活之中存在諸多以身體作秀來表達欲望的行為；另一方面，政治話語中仍然有一套標準，強調健康良好的身體(以及身體裏的思想)對於社會建設的重要意義。只不過人心大變樣，怎樣選擇與行事，端賴於每個人的智識水平與道德意識。

### 註釋

① 馮珠娣(Judith Farquhar)、汪民安：〈日常生活、身體、政治〉，《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1期，頁109。

② “Embodiment”是本書的關鍵詞彙之一，也是身體研究中的關鍵詞，譯法較多。本文採用「身體體現」一詞而不是中譯本的「體現」，既不至於誤解，也符合馮珠娣的意圖：歷史在身體上的體現與印刻。參見Judith Farquhar, *Appetites: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③ 伯曼(Marshall Berman)著，徐大建、張輯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23、112。

④ 前者以衛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等各領風騷一時，後者以沈浩波、李紅旗、尹麗川等詩人為代表。參見李清霞：〈新時期以來「欲望話語」流變——兼及「下半身」詩歌的文化批判〉，《南方文壇》，2011年第3期，頁111-14。

⑤ 〈法新社：外國人在上海舉辦同性戀文化節〉(2009年6月17日)，騰訊網，<http://news.qq.com/a/20090617/000597.htm>。

在中國社會，歷史(傳統)與政治的力量依然強大，足可為身體行為乃至思想的言語表達設定底線、框定範圍，因而掌控個人身體亦非完全不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制度性的結構與權力仍然束縛或駕馭着身體。